

郑和与海外华人 (1)

摘录自陈达生所著的
《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

郑和所见到的南洋海外华人

明初郑和从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在位于南洋群岛的爪哇、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发现数个华人聚落或社区,这一重大发现对中国史和东南亚史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对郑和下西洋所肩负的外交和外贸使命,新增添了一个附加政治与文化因素。由于这些附加因素的存在,对印尼华社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在爪哇的传播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与巩珍在出使中看到不少来自福建与广东的华侨,包括一些华人伊斯兰教徒定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华人聚落主要分布在爪哇的满者伯夷(Majapahit)、杜板(Tuban)、新村(Gresik革拉昔,又名锦石),苏鲁马益(Surabaya泗水),苏门答腊的旧港(Palembang)以及加里曼丹的三巴斯(Sambas)。

郑和下西洋初期,流寓印尼的华人聚落及其分布情况有以下特征:第一,除了王城满者伯夷坐落在内陆外,其他华人聚落多散布在爪哇与苏门答腊的沿海



苏门答腊阿齐市的拉惹白督曼清真寺(Masjed Raya Baiturrahman)建于1614年

港口;第二,华人中只有少数信奉伊斯兰教,华人穆斯林或华人回民是少数社群,并且集中居住在王城满者伯夷及沿海港口;

第三,非回民的华人占大多数,散居在王城以外的沿海地区以及苏门答腊的旧港,多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漳州与泉州。第四,华人多经商如施进卿,或亦商亦盗的泉雄如梁道明、陈祖义,颇受当地政府的敬畏。第五,在华人众多的地区如新村、旧港等,享有自治的权力,由华人村主管治。

早在宋朝(960-1297年),中国私商船只就已到过三佛齐(旧港古名)和爪哇的港口从事香料贸易。“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然而,这些私商交易完后,旋即回航,鲜少定居下来。相反的,印度与阿拉伯商人则多在中国与东南亚经商口岸作长期居留,建立贸易根据地。

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是明初实施海禁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明朝政府垄断对外贸易活动。只允许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严禁私商与人民出海及外商来华进行非法的私商交易,断绝了中国私商及外商的谋生之路,导致许多中国沿海私商,尤其是广东与福建漳泉商人,到海外谋生,形成定居海外的华人社区,其中一些更铤而走险成为亦商亦盗,在海上和沿海掠劫商船与村民。公元14世纪末华人聚落开始出现在爪哇和旧港,广东人陈祖义就是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旧港,成为当地的头目,经常劫夺过往商船。马欢用“逃居此地”,“窜居此地”等词语来形容满者伯夷、杜板及旧港的广东与福建漳泉人留居海外的背景。马欢作为郑和随员之一,显然是从朝廷官方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放洋不归的弃民移居外国的原因,因为根据海禁政策,任何人擅自出海就是犯法,是逃犯。马欢也注意到满者伯夷的华人中“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马欢指出满者伯夷的“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即阿拉伯或印度伊斯兰教商人。自宋元两代,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伊斯兰教商人长住在海上丝绸或陶瓷之路起点的泉州。到了明代,他们的后裔大部分都已华化了,称为回回人。元朝从西域和西亚引进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伊斯兰教徒,人华后被华化,元、明两朝也通称他们为回回人。伊斯兰教商人在满者伯夷受尊

崇为上等人,华人二等,底层为土著,但满者伯夷在郑和和下西洋时期还是根据印度教文化治国的土邦,缺乏政治诱因吸引当地华人改奉伊斯兰教,因此,满者伯夷的华人回民应当是来自中国的回回人或其后裔。

泉州的回回商人世代居留泉州经营香料与中国丝绸、陶瓷以及茶叶贸易,他们多和汉人通婚,因而高度华化,最著名的是曾任宋元两朝泉州市舶司市舶使的蒲寿庚及其家族。宋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罗遏率百余蒲姓族人逃往海南岛儋州,与国际香料与中国贸易网络有密切联系,也深受海禁政策严重的冲击,因此,不少泉州与海南的回回族人于明初到海外发展,直击香料贸易的腹地南洋群岛,有些留居满者伯夷,海南三亚的蒲氏族谱也提到不少族人于明初移居番邦。

此外,满者伯夷的华人伊斯兰教商人中也可能包括13世纪末入侵爪哇元朝大军中之回回士兵的后裔。元世祖忽必烈于1292年底派大军远征爪哇,导火线是爪哇王把元朝使者孟琪晾面逐回,“帝怒决意伐之”,大军临行前,忽必烈特别叮嘱他的将领:“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军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以此进讨”。远征爪哇还有另外的政治目的,即招徕其他小邦来华朝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忽必烈下诏史弼、也(亦)黑迷失、高兴三人率领大军远征爪哇。史弼负责军事,也黑迷失掌海道。格罗思维(W. P. Groeneveldt)误指也黑迷失和史弼为蒙古人,其实,也黑迷失是新疆回回,畏吾儿人。)蒙古人也称畏吾儿为“回鹏”。蒙古人通称“回僧”为穆斯林。《元史》记载史侧字君佐,其本族名塔刺浑,河北博野人。元代时,来自西域的色目人除了本族名之外,都加漆一汉名,因此,史弼很可

能是色目人的后裔,即同回人。高兴字功起,河南蔡州人,从其世以农为业,且无族名来看,高兴当是汉人无疑。他是第三统领。元出征爪哇大军原来的计划,包括征召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兵2万,有“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等配备。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精兵多驻守军事重镇及政治中心如上都和大都,华南沿海各省包括福建及湖广主要由汉兵驻守,回回兵及蒙古兵则驻防江西。元朝远征南方诸国向以汉军为主,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派汉军2000,蒙古军500由陆路出兵交趾,蒙古精兵不善海上战事和远航,因此,远征军中如有蒙古兵也是象征性质。从兵士征召的地区来看,爪哇远征军是以汉族和回回兵为主力组成,由回回将领统帅。忽必烈似乎觉得海战非其所长,况且长途跋涉由海路出兵爪哇,难度相当高,于是突然在大军出发之前改变军事计划,将原来轰轰烈烈侵占性的军事行动降为惩罚性战事,虽员由2万削减四分之三至5000,陈路攻打边境的交趾都出员2500,而海路远征爪哇只派兵5000,几严成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也决定了爪哇远征失败的结局。彬密院事后追讨多发放的军款,至元三十年(1293年)“权密院臣言,去年征爪哇二万,各给钞二锁,其后只五千人往,宜征元给钞三万馈人官。帝曰:非其人行,乃膜中止之耳,勿征。”可见忽必烈是在大军出发前夕和军粮都已发放的仓促情况下改变计划,但是其动机不明。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删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风急涛酒,舟城簸,士率皆数日不能食”第二年(1293年)正月大家抵达爪哇。当时爪哇与邻国葛郎交恶,爪哇王为葛郎所系,爪哇王之婚士罕必圈耶向元军求救,联手攻葛郎,战事剧烈,终于攻克葛郎,但双方死伤惨重。“土

15世纪印尼华人聚落分布

华民留寓地	华民	附注
满者伯夷	广东、漳泉人,不少信伊斯兰教	“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馆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
杜板	广东、漳泉人	“此处(华人)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派州人流居此地。”
新村	华民千余家,村主广东人	“番名日革儿昔(Gresik)。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
苏鲁马益	有中国人	“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
旧港	广东、漳泉人数千家	“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明史》:卷324)

资料来源:《明史》,《瀛涯胜览》(马欢),《星楼胜览》(费信),《西洋番国志》(巩珍)。